

劉羨冰 著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Intercâmbio Cultural 雙語
BILINGUES Bilinguismo Intercâmbio Cultural 雙語
雙語精英 文化交流
BILINGUISMO Intercâmbio Bilinguismo
CULTURAL

濠海叢刊

吳志良主編



澳門基金會 出版

劉羨冰著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啓功題籤



吳志良主編

濠海叢刊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

作者：劉羨冰

叢刊題字：錢君匋

封面題字：啓功

封面設計：李耀斌

副主編：馮少榮

執行編輯：呂平義

助理編輯：姚翠玲

出版：澳門基金會

排版：廣東省江門市江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輝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

定價：澳門幣60元

ISBN 972 - 8147 - 23- 6

沙漠與綠洲

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澳門是文化沙漠。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去年底，我們籌備出版《澳門論叢》時，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半年的工作，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最初的想法，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澳門論叢》，作為對籌備經年的《澳門叢書》的補充和輔佐，但學術界對《澳門論叢》反應之熱烈，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僅僅半年的時間，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有些論述性強些，完全可以納入《澳門論叢》；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述重於論，但都頗具價值，與我們編輯《澳門論叢》的初衷並無二致。因此，我們決定設立《濠海叢刊》，與《澳門論叢》相輔相承，以吸納更多的作者，包容更多的題材，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推廣澳門的目的。

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去反駁澳門“文化沙漠論”。然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形成一片，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們相信，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讀過這些書之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文化沙漠論”也不攻自破。

吳志良

一九九四年八月

序

周德昌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一書是劉羨冰女士研究澳門史、澳門教育史的學術論文集。它凝結了作者近年來在這個學術領域裏，勤奮學習、刻苦鑽研而獲得的可喜成果。

澳門是400年來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窗口和橋樑。正如作者所說的：“西學東漸，給古老的東方文明輸入新鮮血液；東學西漸，燦爛的中華文化如比是天賜歐洲啓蒙運動一份厚禮”。

在中國土地上一所最早的西式學校馬禮遜學堂就是1839年在澳門創辦的。具有先進教育思想的中國近代著名人物，洪仁玕、容闕、鄭觀應、康有爲、孫中山等人都是直接、間接地在澳門接受到西學的洗禮和接觸到西方的教育模式的。但是至今爲止，中國教育史學界在這方面的探討還是不多的。因而對澳門教育史的研究，它無疑是一項填補空白的課題。同時它對地區教育史、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撰寫也會起一定的補充作用。

《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一文，是這本集子中的精華。作者以豐富、翔實的史料，深刻的分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這是令人注目的。如：澳門是歐洲人學漢語的最早基地之一；澳門創立了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澳門孕育了歐洲第一位影響深遠的漢學家——利瑪竇；中國

最早的留學生從澳門放洋，等等。所有這些都表現了作者在學術研究能力方面具有較高的素養。加上本書圖文並茂，文字典雅、清麗，是很值得一讀的，它的問世爲我國教育理論界提供了一本有一定參考價值的中國教育史、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的著作。

作爲老一輩的教育理論工作者和導師，我看到了自己的學生和朋友在學術上獲得新的進展和成就，心裏是很高興的，也是極爲支持的，故在本書出版之時，致以祝賀和勉勵之意。是爲序。

1993年3月於華南師範大學

序

夏東元

語言是人類社會生產、生活及一切活動的人際交往的工具，是促進經濟、文化等文明發展所必須具有的手段。沒有語言這個工具或手段，生產、生活等活動就難以進行，社會將停滯不前，實際上也可說不成其為社會。在長期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個民族和許多不同的國別，逐步形成自己的語言。因此，各個不同語言的民族和國家之間，要進行交往或交流，就必須解決語言不通的問題。這就提出“雙語”的問題，即需要既懂這一民族或這一國的語言文字，又能講另一民族或另一國家的語言文字的人才。祇有這樣，不同語言的民族或國家才能順利地進行它們之間的經濟與文化活動，也才能較好地相互取長補短，促使各自的社會更快前進。如果沒有“雙語”這樣的人才，那麼，各不同語言的民族或國家，祇能是封閉隔絕，各自的優缺點難以比較，“固步自封”就是必然的了。社會的發展緩慢也就在所難免！

由此可見，語言是人類社會必不可缺的工具，“雙語”是不同語言的民族或國家之間交流的手段。“雙語”人才自古以來就有，近代以還各國交往頻繁，對“雙語”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多，尤其是中國乃至許多國家改革開放成為時代潮流的今天，

“雙語”人才或是“雙語精英”，就更其迫切需要了。在這種情況下，研究歷史上雙語人才及其與經濟文化交流的關係，就成為學術上很重要的課題了。劉羨冰女士所著《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一書，就是這一課題的學術成果。該書以中國較早與西方交流的窗口並達400年之久的澳門為主，論述“雙語”的發展過程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頗具典型性。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由15篇論文所組成，但從總體看，卻體現了自成體系的組合。第一部份一篇，此篇可視為本書總論，論述雙語人才與中外交流的關係。第二部份四篇，從敘述語言溝通的歷史狀況說到利瑪竇對漢語認識水平的意義及中、葡、英三語並存和作用。第三部份六篇，論述雙語乃至三語的發展，促使東學西漸、西學東漸的東西文化融合對流，對中國和西方的文化發展均起了良好的作用。第四部份四篇，着重介紹“世居澳門”的鄭觀應對西學的正确態度，澳門這個中西文化交流窗口對鄭氏著述《盛世危言》的意義和影響，並具體說到鄭氏家族所建的比較集中體現中西文化的“鄭家大屋”的歷史價值。總之，作者通過15篇論文，完整地體現了“雙語”對東西文化交流的作用及其對社會發展的進步意義。

《雙語精英與文化交流》，是運用語言學、社會學、歷史學以及文化交流等學問結合起來進行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它正確地闡述了澳門這個半島作為較早對外窗口的發展過程，也正確地反映了“雙語”與中外文化交流的規律性。這本佳作問世，應可看作向1999年澳門回歸祖國的獻禮。是為序。

1994年6月5日於滬上臨淵齋

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
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

啓功題籤



目 錄

沙漠與綠洲·····	吳志良(I)
序·····	周德昌(I)
序·····	夏東元(III)
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中外文化教育交流 ·····	(1)
前言 ·····	(1)
一、澳門是歐洲人最早學漢語的基地,也是西式教育 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方·····	(3)
二、澳門孕育了西方第一位漢學家——利瑪竇·····	(7)
三、遠東第一所高等學府在澳門創辦 ·····	(13)
四、澳門是東西文化教育交流的門戶和窗口 ·····	(20)
五、歐亞漢學在澳門交相輝映的時代 ·····	(33)
六、澳門又孕育了英國漢學家的先驅——馬禮遜 ·····	(46)
七、澳門葡人的漢語課程從修院推向社會,進入中、 小學正規課程 ·····	(54)
八、華務局翻譯員課程及其出色校友高美士 ·····	(64)
結語 ·····	(75)
澳門開埠前後的語言狀況與中外溝通·····	(84)
利瑪竇的漢語觀 ——400多年前西方人眼中的漢語 ·····	(91)

澳門的三語流通與中文的健康發展 ——兼評chenglish	(97)
澳門雙語社會的特點與确立中文官方地位的最後衝線.....	(112)
傳教活動促進中外哲學交流	(125)
東西文化熱風對流與儒家道德思想的傳播	(131)
《聖諭廣訓》葡譯本在澳門出版的歷史意義	(145)
從孔子的“六藝”到顏元的“六齋”	(159)
“中體西用”非張之洞《勸學篇》的主旨	(176)
調查報告——中國傳統道德觀對澳門新一代的影響 ..	(192)
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	(203)
鄭觀應對西學的立論和態度	(215)
林則徐從澳門開眼看世界	(219)
1553.1849澳門歷史上兩個值得重視的年份 ——從《基本法·序言》16字概括談起	(231)
後記	(239)

澳門歷史上雙語人材的培養與 中外文化教育交流

前 言

澳門原是中國南方沿海一處小漁村，自1553年，葡萄牙商旅獲准停泊，1557年築室居留至今，已400多年了。除葡人外，還有日、荷、英、東南亞各地商人以及各國的傳教士，先後涉足這連兩離島計算在內也僅得十幾平方公里的彈丸小地上。本地有操粵語的居民，有早已往還不息的操閩南話的商人和漁民，操官話的縣治官吏，澳門的語言狀況真是多彩多姿，好象一個大拼盤！

不是悠長的歷史一步一步地鑿通不同民族群體、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語言壁壘，中國的多方言和歐亞的多語在澳門相碰，那將是何等複雜和阻滯的局面！

語言是人際溝通的工具。不同語言群體之間的溝通，400多年以至今日，一直是澳門多語社會的重要問題。

開始時，葡商聘得與中國通商來往已久的阿拉伯人、東南亞人、特別是馬六甲人作翻譯，通過第三者的媒介作用，中、外人士得以溝通；繼而通過生活、貿易的接觸往來，雙方開始一般的直接的溝通；但是，作為外交的正式官方往來，作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傳教活動，作為文化藝術的交流，則必須有精通雙

語的人才，才能適應這些深層面的語言、思想和行為的溝通。因而，最終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手段，祇能依靠教育。因此，澳門教育史上雙語人才的培養有它特別的、重要的意義。

16世紀末，以教育活動為主要工作形式的天主教耶穌會教士東來，把西方教育制度引進澳門，寫下中國西式教育的第一章，使澳門開始了一個中、西教育並峙、雙軌發展的局面；為了培養通雙語的傳教隊伍，澳門誕生了遠東最早的高等學府，送出中國首名的留學生；由於澳門是歐洲人最早的學漢語的基地，歐洲第一本稱得上漢學專著的作品，第一位稱得上漢學家的歐洲人，第一部漢語——拉丁語字典，首部漢英字典，都是在澳門孕育的；甚至歐洲的中國學院、第一所西式的中文學校——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世界上第一部拉丁文譯出的《四書》、第一部漢譯的《聖經》……都和澳門這彈丸小地結下不解之緣。澳門還是明季東西文化交流的門戶，是教士漢學、歐洲漢學的發源地。

可惜這些在教育史、在文化史上閃閃生輝的史實，過去不大為人注意。澳門歷史最為人所注目的，往往是鴉片貿易、豬仔販賣、嫖賭飲吹的銷金場所，以及今天的賭國風光！

1987年4月13日，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宣告到1999年12月20日，中國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應運而生，在幾年內先後出版了黃鴻釗的《澳門史》、黃文寬的《澳門史鉤沉》、費成康的《澳門四百年》、郭永亮的《澳門香港的早期關係》等研究澳門歷史的專著……打破《澳門紀畧》一花獨放250年的局面。澳門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橋樑作用也被國內外學者注意，作出許多介紹和評價；聯繫到鄭觀應、康有為、孫中山的先進思想、改革倡議和革命活動，澳門的歷史價值漸漸被發掘、被肯定。這些成果改變了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的觀感。

我在國內外學者的啓示中，在搜集澳門教育史料，攻讀中國教育史的過程中，感到澳門400多年的歷史，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個“特區”的歷史，文化教育方面有不少值得發掘的東西。在此過渡期間，作為澳門人，為迎接新特區的來臨，整理舊特區的往事，從中外的溝通、雙語人才培養的角度，追尋歷史的軌跡，這是本文探討的意旨。

一、澳門是歐洲人最早學漢語的基地， 也是西式教育在中國最早出現的地方

14世紀以後，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一浪高似一浪，人文主義、民族國家的浪潮沖激着至高無上的神權，衝破教會對學術和教育的壟斷。到了16世紀，宗教改革運動也應運而生。

第一節 耶穌會的成立及耶穌會的教育

在宗教改革如火如荼之際，1534年，西班牙人羅耀拉（Inácio de Loyola 1495—1556）為支持教皇，力圖維持天主教的傳統地位，成立了耶穌會，成為舊教的一支新興的改革力量。他們的創會宗旨，為抵消新教的影響，提出要“讓世界服從羅馬教廷”，具體行動之一是在歐洲外另闢新天地，東方就是他們嚮往的地方。

隨着15世紀航海事業的發展，在“地理大發現”的勝利歡呼聲中，歐洲人，特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為擴展殖民主義而激烈角逐。1493年，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為此而裁定了兩國的勢力範圍，以佛得角和亞速爾群島以西處為界，界以東屬葡，以西屬西，中國剛好被劃進葡的保教權內。於是，耶穌會傳教士就

與葡萄牙商旅互相依靠，一道東來，前者以傳教為職志，後者以追逐商業利益為目標。他們背後則分別有教皇和國王的支持。

耶穌會的傳教活動，是以教育為中心工作的。他們要求每一位教士，不但思想虔誠，有深厚的神學、哲學的知識基礎，還必須學有專長，能當出色的教師，要有出類拔萃的語言能力。他們到哪裏去傳教，就在那裏辦學校。從創會到該會被教皇克里門十四解散的239年之中，耶穌會在世界各地辦了不少出名的學校。^①耶穌會學校德育標準是要“培養被基督的信息所轉化的新人”，其智育的標準則是要培養“傑出人士”。^②為了適應這一要求，耶穌會教士不少是飽學之士，一般有較高的文化素質。

第二節 耶穌會傳教士東來

1542年，被譽為“遠東開教元勳”的方濟各·沙勿畧(S. Franciscus Xaverius 1506—1552)，離印度果阿東來。在此之前，他在印度“賤民”中，一下子使七萬人入了天主教，因此他是滿懷新希望東來的。1549年，沙勿畧到了日本，27個月的逗留，他的傳教工作既有一些成績，同時又碰到不少困難。而最大的體會，是他開始理解到中華文化對日本的深刻影響。他在寫給歐洲一位教士的信上說：“日本現行的教派，無一不來自中國，中國一旦接受真道，日本必起而追隨，放棄現有各派。”^③

後來，利瑪竇更進一步體會到東方有一個中華文化圈的存在，漢語不但是人口眾多的中國人使用的語文，而且是中華文化圈中的學術語言，和歷史上的希臘文、拉丁文、梵文一樣。

因此，學好漢語，好比掌握了進入中國的鑰匙，同時還是進入日本、朝鮮、越南和整個中華文化圈的鑰匙。

第三節 澳門成爲教士學漢語的基地

耶穌會傳教主要方向，“首先贏得有文化修養階層的友誼，以便一直進入宮廷”。^④因此，耶穌會傳教士不但學粵語、閩語等方言，還着重學官話；另一方面他們又了解到中國的各種宗教，都是以文字書籍的方式來流通傳播的，不是以口頭傳播爲主的。中國人討厭群集結夥，但“讀書人在休閒中所讀到的書本的說服力量，比從講道臺上轉來的說服力量更大”。^⑤教士們十分清楚，不精通漢語，就不能接近上層知識份子，更不可能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他們就把能否掌握漢語這一溝通工具看作成敗的關鍵。

1578年，耶穌會印度教團視察員范禮安(Alexander Valignan)到了澳門，認爲要在遠東傳教，“必須另派一批有理想的、有中文基礎的神父來”，“最重要的條件是會讀、會寫、會說中國話，並熟習禮規和民情”。^⑥

於是，羅明堅、利瑪竇等就先後在1580年、1582年來到澳門，集中精力學漢語。自此以後，凡東來的教士，大多集中在澳門先學漢語，認識中國。這成了習慣，後來還形成制度。

第四節 澳門中西教育並峙，雙軌

平衡發展400年

澳門自古是一處小漁村，除商旅、漁民等流動人口外，原居民是很少的，教育不發達。但華人向有重視子弟教育的傳統。相傳200多年前，即17、18世紀在沙梨頭土地廟已有“更館社學”；香山縣志載1777年及1801年，望廈村趙元輅、趙允菁父子先後中舉，成爲一時的佳話。望廈村至今仍留“黃東暘書屋”遺址，鄰近前山一帶有鳳山、鳳池書院，雍陌、小欖、古鎮歷年

也有一些秀才、舉人。但前山、珠海和澳門則不多。那些宗祠、廟宇，延聘塾師坐館，課以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均屬中式的傳統的封建教育。（附圖一）

另一方面，從16世紀中開始，葡人和歐洲各國商人在澳門定居，人口不斷增加。由於葡萄牙以天主教為國教，葡王葡商均支持教會在澳門的工作。1576年澳門天主教教區即告成立，第一任主教卡內羅（Melchior Carneiro）即獲准以葡萄牙海關千分之五的關稅，來作教會的慈善經費^⑦，教友去世，也有自願捐出產業支持教會的。教會就先後在澳門開設教堂、仁慈堂、醫院、痲瘋院、孤兒院。因為天主教的神職人員，要負責為當時在澳門居住的葡國商人、水手及家眷、家僕進行宗教儀式，除了聖洗聖事之外，還要發揮教化的作用，約束葡人的“不良行為”，使他們遵守教規。因此，傳統天主教的堂區和修會會院都設要理班，兼授語文和文法，開啓民智，掃除文盲，其中有教育葡童的，也有教華童教友的，以當年耶穌會的學塾最著名。^⑧這是耶穌會教育在澳門的肇端，也是西式教育引進澳門、引進中國之始。從此，澳門的教育就形成了一個土、洋並峙，中西兩式教育雙軌平行發展的局面，這正是澳門教育起源，400年前的一大特色，也是澳門教育史發展的基本軌跡。

400年來，繼續來澳辦學的天主教會，有仁愛會、家辣會、方濟各會、嘉諾撒會、慈幼會等。西方近代教育源源不斷引進澳門，發展成為澳門教育的主要支柱。到20世紀80年代，全澳天主教中、小學學生人數（包括幼稚園）已達到全澳學生總數的1/2，至今仍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